

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的当代价值

杨刘秀子

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 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不仅深化了文化认同的建构,强化了其作为启蒙利器的角色,还通过形成“香港—东南亚”报刊文学特有的联动文化圈,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些报刊文学作品丰富了文学传播的路径,为华文文学的传播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它们也肯定了华人报人在办报过程中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财富。

关键词: 近代香港; 华文报刊; 报刊小说

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按照文体划分,可以分为:报刊小说、报刊戏曲、报刊说唱文学、报刊散文和报刊诗词,这些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家国情怀。在讨论香港文献时,王赓武曾提出:“一些最早的和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都侧重讲述英国方面的故事。”^[1]卢玮銮亦谈到:“在历来忽视历史的香港、在贵远贱近的研究心态下,香港文学资料,大抵没有任何收藏价值。”^[2]事实上,近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重镇,其华文报刊文学具备浓厚的学术价值,在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能启发当代社会的文化认同。

从 1853 年问世的第一种华文报刊《遐迩贯珍》起,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一代又一代报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留下了一批属于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报刊以文字史料为中心,对文献作了较为全面、立体地保存,展示了各种文体的面貌特征。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的兴起,不仅是对文体与文学现象的一次深刻反映,更是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一种深远影响。它极大地增强了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推动了香港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报人们深知文化对于人的塑造力量,因此,他们积极以刊载文学作为宣传思想的关键,不仅丰富了报刊的内容,更促进了报刊自身的长足发展。这些报刊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文化传承的使者,为我们理解近代香港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窗口。

1. 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深化了华文报刊文学作为启蒙利器的作用

自维新与改良风气渐起,文学走进了大众的报刊视阈与报人的政治理想中。报刊文学在广为流传之下,逐渐下沉

至民间成为启蒙的利器,民众关注的内容会在传播中形成逐位上移的趋势,最终影响统治阶层的意志。通过文学内容的建构来影响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是近代香港不同党派报刊文学作者的着力点。以小说为例,受到“小说界革命”影响的近代香港报人广泛地以历史上有爱国精神的人物故事作为蓝本进行书写与传播。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而言,近代香港报刊文学作者对明末遗献、遗史内容多有挖掘,对宣传政治思想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唤起华人的历史记忆,引起读者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抵触情绪,为香港华人政治活动的合理性开展提供历史文字依据;另一方面,为政治运动树立了典型的报国个体形象,阎应元、岳飞等历史人物成为了当时民族之魂的象征。此外,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还有三处体现了对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其一,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作者塑造了许多寓意中华文化的角色名字,如《烟雨镜》中的“捍家军”寓意“汉家军”、《侠女奇男》的男主人公宗国昌蕴意了兴复中华民族的愿望。作者在人物命名中倾注了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其二,香港报刊文学充满地域方言特色,作者以粤语写作的范式强化了文化认同。其三,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关注华人“劳工”的生存境遇和爱国作为,书写华人在奋斗历程中遭遇不公的故事,将远在海外不能见到的微观生活和个体情感具象化、文学化,有利于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2. 形成了“香港—东南亚”报刊文学特有的联动文化圈

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在近代文学领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仅在本地繁荣发展,更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东南亚地区的报刊文学形成了紧密相连的联动文化圈。这

一文化圈的形成,标志着华文报刊文学在近代文学领域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香港,作为这一文化圈的核心,不仅在文学创作与传播上发挥着重要的辐射作用,更在政治事业上引领着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群。革命派的报人们,以笔为剑,以报为盾,以文学为利器,将革命的火种通过报刊传播至千家万户,使得华人社会对革命理念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革命派报人将鼓吹革命之思想寓于笔下,借报刊之势传入大街小巷,使香港的华人社会无人不知晓何为革命。在境外的华人,无论是支持保皇,还是赞成革命,许多人都有旅寓过香港的经历。作为一个“中转站”,香港为他们提供了来往的轮渡,他们当中不乏报人的身影。在“淫书之报显有可微也”的观念下,东南亚地区报刊文学出现的时间较晚,当地文学事业滞后。1907年后小说才大量出现,这与香港报刊小说的传播和东南亚地区报人自身对小说观念的转变有关。由于革命派与保皇派在东南亚地区均要争取华人的支持与认可,许多党派内人士身兼报职,在东南亚报馆担任主笔。一定程度上,东南亚地区报刊文学的萌生受到了香港报刊文学的滋养,且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有一批“共享”的报人,如黄伯耀、黄世仲、王斧、陈楚楠、林文学、康荫田等人。因此,可以说,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与东南亚地区的报刊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动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学的交流与传播上,更体现在文化认同与政治立场的共享上。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些在香港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穿梭的报人们,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为这一联动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增强了文学传播的路径

为了使更多读者能读到文学,扩大影响和销路,近代香港许多报刊出版社除了在报刊中刊载文学外,还尝试了发行单行本、在报刊上登载文学出版物的广告。从报载到单行本,或是从单行本到报载,香港报人有意在文学发行模式的领域作出变化。从报人的种种努力来看,他们希望能打破旧的文学生产、传播模式,以创造出更大价值。通过近代香港报刊上刊载的售书广告以及已出版的书目来看,不少外地的小说曾运输到香港出售,这些小说无疑会对近代香港华文报刊小说,包括报刊小说的发展产生影响;香港一些优秀的小说也被刊行成单行本,并传播到各地,这些作品也对其他地域产生影响。如1899年,香港书局出版了曾在上海《演义白话报》连载的小说《林文忠公中西战记》,该小说撰写的

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带领军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又如1911年,香港香江图书阁出版的《广州乱事记》,曾在广州《南越报》刊载。书局、书楼、出版社利用售书广告宣传介绍小说、刊登销售小说预告,并明码标价,很多广告并非只登报一次,而是连着数十期刊载,以加深读者对此的印象。如《唯一趣报有所谓》多次刊载了宝云楼书庄、英华书庄、经纬楼书庄、“华字日报”馆等的小说单行本发售的广告。还有一些报人的说唱文学作品、诗词作品,亦是如此。

4. 肯定了华人报人在办报过程中的付出

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既有与内地文学同根同源的一面,也有域外文学流入中国后重塑内容的一面,因此,探讨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首先要拨开云雾,为其作为中国性、世界性的文学样本与中华文学共同体的契合梳理关联。而这种关联离不开揭示报人的参与。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最初由传教士主导,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以磨灭华人报人的付出。笔者曾提到:“以往部分学人在探讨近代报刊或《遐迩贯珍》时,往往把传教士的地位放于制高点,忽略了华人的努力。”^[9]《遐迩贯珍》时期,报刊中并没有过多记载华人报人的名字,当中的寓言故事等文学作品的书写与译介出自何人之手并没有直接展示出来。通过史料推测,可以发现黄胜等华人报人在《遐迩贯珍》办报过程中的践行。自《中国日报》问世后,香港华文报刊界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华人报人,他们广泛利用走近读者的策略,增强舆论引导的能力,充分利用不同的报刊文体形式,主动抓住宣传机会,而报刊文学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传播文体。

由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的重要影响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具有紧要意义。从研究价值来看,此一视角既可以对在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爱国报人展开深刻讨论,又可以对家国情怀的内容传播加以观照,既重视作为地域的“点”的探赜,又兼顾了由点及“面”的文化认同构建,将点与面相结合,使文学内容思辨与报人创作动机相联系,从而达到认识这一时期的香港华文报刊文学的特色。近代香港华文报刊文学的研究与诠释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在悠长的传承与传播中华文化进程中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培育中华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土壤中自觉建设、自觉保护、自觉发展的能力,使报刊文学从一种文学文体成为可以传承传播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王赓武. 香港史新编 [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1.

[2] 杨国雄. 旧书刊中的香港身世 [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序一.

[3] 杨刘秀子. 近代香港中文报刊的内容变相与学术视

差——以黄天对《遐迩贯珍》研究为中心 [J]. 暨南史学, 2021 年第 23 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香港报刊文学整理与研究(1840-1919)”的阶段性成果)